

其他有关报道的文章：

永远的科学家园 《科学时报》记者李芸

(2011-09-23 07:13:02)[[编辑](#)][[删除](#)]



2005 年温家宝总理去探望钱三强夫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女士时，看到她家陈旧、局促，走廊里也堆满了书，便劝她搬个新家。何泽慧婉拒道，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中关村特等宿舍楼 14 楼 203，何泽慧院士自 1955 年搬入一直住到 2011 年她驾鹤西去。

中关村 13、14、15 三幢特等宿舍楼，简称“特楼”，建成于 50 多年前，曾居住着钱学森、赵忠尧、钱三强、贝时璋、童第周、赵九章、郭永怀、顾准等许多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学界泰斗。如今，这三幢楼房已非常陈旧，置身于高楼林立、五光十色的中关村，更显寒酸。但这里却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摇篮、是中关村的灵魂。

《中关村回忆》，蔡恒胜、柳怀祖等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7 月出版

## 往事不能如烟

2006 年，离乡 20 余年的昆虫学家蔡邦华之子蔡恒胜重回中关村，在中关村特楼——他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睹物生情，怀旧与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北美后，蔡恒胜深感有责任把第一代中关村人——当年一批把知识、智慧，甚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人民科学家的真实事例记录下来，于是开始用“中关村人”的博客名撰写了《中关村回顾》的系列文章，发表在中文网站上。

2008 年蔡恒胜再次回国，和特楼部分科学家的子女们进行了一次聚会，并萌发了联系这三座楼的子女，撰写这一段中关村历史的想法。

同为中关村人第二代，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先驱者柳大纲之子柳怀祖欣然成为组稿者之一。终于，历经五年，这部集合了 28 位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后辈回忆文章的《中关村回忆》，于今年 7 月出版了。

成书过程中，贝时璋、钱学森、朱光亚等诸位大师相继离世，让第二代中关村人深感出版此书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是在做抢救记忆的工作。”柳怀祖说。

2010 年，答应一个月交稿的郭沫若之子、理论物理学家郭汉英突然失去联络。柳怀祖打电话过去，才得知郭汉英去世，遗物中留下的书稿也成为遗作。“还有些当年的伙伴，因几十年的离散，已经联系不上了，成了我们的遗憾，也是本书的极大缺憾。像分析化学家梁树权和高分子物理学家钱人元的后人，我们都尽力找寻，但一无所获。”柳怀祖感叹说，“如果这本书早 10 年来做，会少许多遗憾。”

## 字句间的爱与思念

这本著作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侧史，是子女眼中的科学家们。这是柳怀祖为本书定下的基调。“我们不要去涉及、评价父母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这些应由他们的同行和历史去检验。但他们大多数人追求真理的坎坷人生，应如实地记录下来，特别是历史事实，不要掩盖，更不能包装。”柳怀祖说。

“不掩盖”、“不包装”，蔡恒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父母大多为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而我们做子女的也应该老老实实在地写出眼中和心中的感受、展现父母生活的点滴细节。”

也正是如此，我们得以看到这代科学人背后常人难以了解的细节，感受科学人身上流淌着的温暖和爱意。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陈宗器吃饭时会给儿女出各种有趣的鸡兔同笼的数学题，晚上会架起天文望远镜教他们看星星，出差还不忘买《连环画报》寄给爱画画的女儿；气象学家赵九章是一位慈父，从不打骂孩子，连一句重话都不曾说过，也是一个可以撒娇的父亲，每天早上都经不住“赖床”孩子的请求给他们讲一段《西游记》；而植物学家林镕则是一位多才多艺、幽默风趣的父亲，在缺衣少吃的战乱年代，孩子们饿了没饭吃时，他就画个大饼充饥，最可乐的是“看咸鱼吃饭”，叫孩子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竟然把孩子们哄得不再“抗议”了……

## 特楼精神的守护与传承

随着贝时璋、何泽慧的逝去，在中关村特楼里的第一代中关村人只有李佩仍守护在那里。李佩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郭永怀的夫人。

1968年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李佩又在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经历过人生大悲大苦的她淡定、坚韧如初。李佩的品格和学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用武之地，这时候她已经是将近60岁的老人。但她坚持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持英语教学十几年，退休后她仍关心中关村社区建设，组织中关村老年活动中心的活动，关心老科学家们的家庭困难，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

在《中关村回忆》中撰写回忆郭永怀、李佩夫妇文章的顾准的女儿顾淑林，曾问李佩经历那么多事是如何扛过来的。李佩的回答再简单不过：“我没做什么。活着，就要做一点有益的事。”

一腔热血、无私奉献、不计报酬、甘于清贫、不图名位……把所有这样的词加在特楼科学家身上，都不为过。但从他们自己嘴里说出来可能只有“活着，就要做一点有益的事”！

《中关村回忆》出版后，柳怀祖又一次读起这些文章，读到那些熟悉的细节，仍为之动容，他说：“让人感慨的是那代人的信仰。他们经历了祖国 20 世纪后半叶的风风雨雨，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地挺立着，毫无动摇，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祖国的科学事业。我们在这里怀念老一辈科学家不懈的人生追求，就像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在序言中所说的，‘希望此书的出版能给今天千千万万的年轻学子以启迪。’”

《科学时报》(2011-08-31 B3 读书)

## 《中关村回忆》出版的感受 -兼答《科学时报》记者李芸 蔡恒胜

(2011-08-29 22:32:54)[[编辑](#)][[删除](#)]

这本书没有专门组织策划，而是在出书过程中，自然得到很多人、特别是中关村的后人的共鸣、支持和响应，大家都认为这是件有意义的事。

2006 年，离乡二十余年的海外游子重回中关村，睹物生情，面对时光的巨大反差，一种怀旧，思念亲人的感情油然而生，当我回到北美后，深感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和第一代中关村人——当年一批把知识、智慧、甚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人民科学家的真实事例纪录下来，于是开始用“中关村人”的博客名撰写了《中关村回顾》的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中文网站上，引起许多人，特别是中关村后人的共鸣。

2008 年我再次回国，和中关村 13 号、14 号、15 号三座灰砖楼部分科学家的子女们进行了第一次聚会，撰写这一段中关村历史的想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支持，当时在世的一百零五岁高龄贝时璋、九十四岁的何泽慧都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年近九十的郭永怀的夫人李佩老师亲自与会给以支持，特别是和我同住 15 楼的也是我那时的朋友柳怀祖先生，他一生 70 年的成长离不开科学院，他出生成长在这里，大学上的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又在中科院工作直到退休，现在仍在为科学院出谋划策。他和我商量，应当尽可能联系这三座楼的子女，撰写回忆父母的文章。于是我们分别在海内外广泛联系了中关村后人，说服了一些人因为不想触及伤痛的回忆，而有些人不愿违背父母一向低调的意愿，不愿参与写作。不少交稿的科学家后人，又因为对“文革”怀有心结，表示无法“就科学家写科学家”。我们强调的是将自己眼中和心中的科学家们“还原”为自己的父母。历经五年终于在上海交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形成了这部子女和后辈们对他们父辈集体回忆的记录书，深感为完成了这项工作而欣慰。

有人讲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其实很多也都没有说服力。因为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甚至可能自我吹嘘。而近些年来，社会上流传的不少有关中关村灰砖楼里主人们的故事及轶事的文章和书刊，谬误甚多，有的竟纯属荒唐的编造。所以我们的原则是这部书要真实反映我们的父母，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我们的父母多为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家就是老实人，本份的做人做事做学问是他们的最高境界，就他们的经历和人生的态度，用子女眼中和心中的感受来写父母的点滴细节，这不是对父母学术成就和人生的评价，这方面子女也不应去涉及和评价，而应由他们的同行和历史去检验。但他们大多数人追求真理的坎坷人生，应如实的记录下来，特别是事实和历史，即不要掩盖，更不能包装。他们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奉献一生，后人应当分享他的成果，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扬光大，以帮助、造福更多的人。同时他们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严谨的科学作风也应该记录下来，愿更多的后来人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摘录部分科学家们的人生格言和座右铭作为结束：

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 赵九章

《业精于勤，勤能补拙》是我的座右铭

— 王淦昌

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

— 贝时璋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为祖国兢兢业业地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谋取私利，没有虚度光阴。

— 赵忠尧

《思想要奔放 工作要严密》

“办事公道，为人正直”是待人处事的基本准则。

— 童第周

《常看到不足之处学问便有进无退》

— 戴芳澜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作为一个科学家首先要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

— 刘崇乐

做事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相信人民。

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

— 钱三强

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 蔡邦华

一丝不苟 —— 座右铭

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 做人原则、求是精神。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 处世原则。

— 竺可桢

《一生常耻为身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 柳大纲

《我禀赋平平，却从 12 岁起，即好学不倦，勤奋逾于常人，屡历云狗沧桑，不改其度。》

— 黄秉维

“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要虎头蛇尾，不要半途而废，不要等着别人擦屁股”；

“自己事自己做，今天事今天做，不要等别人！不要等明天！”

“不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随波逐流！”

— 林榕

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

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 严济慈

《中关村回忆》：记录小楼留下的大师背影

(2011-08-21 20:28:24)[[编辑](#)][[删除](#)]

《中关村回忆》：记录小楼留下的大师背影 作者：秦珍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关村回忆》封面





如今的中关村“特楼”13号

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在北京市中关村，你很难发现一个名叫“科源社区”的地方。早已生锈的铁门旁，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上面的“科”字斑驳剥落，剩下了“斗”字。不远处，在号称“中国最时尚的电子商城”的鼎好大厦的墙壁上，一块足有5层楼高的LED显示屏幕，正滚动播放着联想最新的笔记本电脑广告。

就像万花丛中的一株小草，“科源社区”完全被淹没在喧嚣的闹市中，特别是其中三栋楼号为中关村13号、14号、15号的灰砖小楼。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名为“特楼”的建筑里，先后住过新中国科学界的数位巨擘。除了人们熟悉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和钱三强、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童第周外，还有气象学家赵九章、中国核物理的开拓者赵忠尧、中国实验原子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甚至包括语言学界“一代宗师”吕叔湘和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家顾准等人。

“少时与他们为邻，真是一生幸事。”2006年，旅居加拿大的蔡恒胜回国，依旧青灰的砖墙让他的记忆鲜活起来。身为中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蔡邦华的儿子，他和家人从1953年起居住在这里，直到1966年搬离。

回到北美，他决定用笔墨留住这段回忆。两年后，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先驱者柳大纲之子柳怀祖也加入其中。2011 年上海书展前夕，这本题为《中关村回忆》的回忆录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集结了 28 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科学家的子女们对其父辈的回忆。

“我们要留一个真实的他们给后人。”柳怀祖说。他表示，这本著作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侧史，即子女眼中的科学家们。

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种着小麦和白薯的农田

很少有人知道，赵忠尧、童第周和蔡邦华曾被称为“三只老虎”。这个外号来源于他们都出生于 1902 年的虎年，又碰巧在特楼做了邻居。

“三只老虎”比邻而居的正是中关村 13、14、15 号楼，每栋 3 层，总共 48 户。住户包括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32 人，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9 人。在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 8 位曾经居住在这里。

作为书稿的组织者，柳怀祖是 1955 年随着父母住进特楼的。当时，在这位高中生的眼里，中关村还是一片种着小麦和白薯等农作物的田地。“保福寺”还是座庙宇，改成小学后，“黑黢黢”的正殿和偏殿都用作教室。

两年后搬进特楼的顾南九是顾准的儿子。他回忆说，刚到中关村感到一片荒凉：“荒草长得比小孩子还高”，南边有很多坟地。

相比之下，建造于 1951 年后的特楼洋气极了。如今已经 71 岁的柳怀祖提起笔来，几下便勾勒出特楼的平面图：中间的 14 号楼呈“一”字型，“L”型的 13、15 号楼如两翼般东西而立；楼前是座圆形的小花园，“外面一圈是冬青，里面种着各种花草”。

“国家那时是尽可能地照顾了。”柳怀祖回忆说，一梯两户的屋子很宽敞，只是房间之间的隔断是用木板和苇子钉上去的，外面抹上泥巴和白灰，“一拳可以打一个洞”。

这位中国科学院原任办公厅主任一边用铅笔画出单元门栋，一边念叨出那些名字：“13号楼，这里是杨承宗，这里是熊庆来，这里是顾准……14号楼，这里是钱学森，这里是钱三强、何泽慧夫妇，这里是贝时璋，这里是赵忠尧……我们老头是15号楼313，吕叔湘是314，王淦昌和赵九章是311和312……”

“特楼里不仅学界泰斗荟萃，而且有的师徒同楼。”蔡恒胜说，14楼里贝时璋的夫人是对门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老师，而住一层的赵忠尧又是钱三强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

当时，人们也会看到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身影。这位“文革”后首批中科院的研究生，也偶尔来此向前辈们请教。

一张薄薄的便签，很快画满圈圈点点，平面图上，新中国一代科学家渐渐显现出来。

正是在这片荒郊上，他们一手创建了中国现代科学的研究所群落，其中包括中科院近代物理、地球物理和应用物理三个研究所，号称科学城中第一楼的原子能楼，实验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所，四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学所、经济所、语言所和哲学所；他们也完成了“两弹一星”、“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质子静电加速器”、“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发现大庆油田）”等重大科技项目，使一些学科完成了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他们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在大街上走着，根本看不出来是大科学家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柳怀祖说，“又是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他总记得，那些叔叔伯伯在楼梯上遇到，就“老张、老王、老李”地打着招呼，“在街上走着，哪能看出是大科学家”？

其中的很多故事和细节，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贝时璋等 4 位学部委员每周都在院子里等一辆吉普车，去文津街的科学院上班；每天早上，钱三强都会准时出现在中关村小卖部门口，排队领取牛奶，中午又出现在 中关村小学的道路食堂里，为外孙们打饭，直到生病住院的前一天；《中国植物志》的主编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午饭都是包子——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队总有人 让位，他故意去晚，学生又把饭端到办公室，最终他只好夏天吃凉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气上，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 5 点就起来蒸包子”。

据王遵明回忆，父亲王淦昌在生活上从没有什么要求。家里用的桌子和柜子，油漆大都已经脱落。父子俩有段玩笑话：“家里连小偷也不愿光顾，倒是挺安全的。”

柳怀祖也回忆，直到父亲去世，家里都没有像样的家具，贮存物品用的还是父亲 1949 年回国时装书的旧木箱。无论是在生活享乐方面，还是场面派头方面，他们都没什么诉求。正如贝时璋所说，“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那时的氛围和现在不一样。”柳怀祖表示，近年来发生的校长剽窃论文之事，在父辈们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几年前他为父亲出版纪念论文集，很多学生要求在一些本由他们署名的文章加上大纲先生的名字后收入该论文集。

“很多论文是他的思想，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甚至有他很多的工作。但他坚决要把自己的名字抹去，不像现在的有些导师。”柳怀祖说。

1951 年，著名物理学家小居里夫人的弟子杨承宗揣着导师亲自颁发的博士学位回国，带着一家老小住进了中关村 13 号楼 105。在儿子杨家雷看来，一家人挤在木凳、床板搭就的“铺板床”上睡觉、经常入不敷出的生活并没有消磨父亲的精神。

这位因留学法国而得名“法杨公”的学者曾因担心同事、学生受到辐射，亲自进行最危险的工作——直接暴露在镭溶液高强放射的照射之下。在操作时，他嘱咐身边的人站在他背后，这样他可以挡去一部分射线。当时，在场数人都记住了这位“原子能功臣”宽厚的肩背。

这件事做得太迟了，我的儿子都未必知道他爷爷的事儿，更别说我的孙子了

“这件事做得太迟了，我的儿子都未必知道他爷爷的事儿，更别说我的孙子了。”柳怀祖提起来很是遗憾。

2010年，答应一个月交稿的郭沫若之子、理论物理学家郭汉英突然与他失去联络。他把电话打过去，才得知郭汉英去世，遗物中留下的书稿也成为遗作。他又花大力气去寻找分析化学家梁树权和高分子物理学家钱人元的后人，一无所获。

不仅如此，起初郭沫若和顾准等人的后代因为不想触及伤痛回忆，都不愿参与写作。不少交稿的科学家后人，又因为对“文革”怀有心结，表示无法“就科学家写科学家”。为此，柳怀祖专门召集老友们开过两次座谈会，强调将眼中和心中的科学家们“还原”。

郭汉英在《忆郭老二三事》一文中，并没有对世人对郭沫若的评价做出解释。在写到1969年“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风波时，他突出了父亲的无奈和坚决：“公开反对批判相对论难以奏效，而默认这种愚蠢的批判泛滥下去，后果将更为严重。”文末他总结说：“时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时代。”

其实对柳怀祖自己来说，父母在“文革”期间被诬陷为“美国特务”的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当时，柳大纲被“四人帮”隔离审查：“如果你不是特务，你为什么要放弃国外那么好的条件回来？”这个问题令老教授哑口无言。

1958年，顾准被打成了右派，一家人在特楼住不下去了，就搬到顾准妻子汪壁在建筑工程部的住所。童第周、柳大纲先后在“文革”期间被赶了出来，被迫迁进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1970

年，真菌学家邓叔群带着淤血与伤痕在 14 号楼 105 中去世；杨承宗直到 1994 年还住在 14 楼宿舍，冬天冷得老人把棉背心缠在腰间。

如今，大师们的背影早已远去，特楼大多为出租户所居住。敲开 13 楼一层住户的门，或拉住楼前散步的老者，问“贝时璋是谁？王淦昌是谁？”反应都是摇摇头。

更多阅读

[《中关村回忆》出版 记录科学家子女集体回忆](#)

者：余传诗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11-8-7 14:26:39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 《中关村回忆》出版 记录科学家子女集体回忆

28 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科学家的子女们对其父辈集体回忆的记录——《中关村回忆》近日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初创时期，在北京中关村 3 栋灰砖楼——13、14、15 号楼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我国基础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如钱学森、顾准、郭永怀、贝时璋、王淦昌、叶渚沛、吴有训、柳大纲、赵忠尧、叶企孙、邓叔群等。他们有的才华横溢，有的爱徒心切，有的舐犊情深，有的快乐潇洒。在学术研究之外，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心境，活出了各自的精彩。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该书序言中说：岁月沧桑，当年居住这里的老一代大多已驾鹤而去，第二代也已过花甲之年早已离开这里，有的还在大洋彼岸定居。近来他们中间一些人旧地重返，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寻访这 3 栋灰砖楼中那个时代的长辈和当时的伙伴，组织编写了这本回忆近半个世纪前灰砖楼真实故事的书，其中有很多事是鲜为人知的。

中关村北区的这 3 栋上世纪 50 年代的 3 层灰砖楼如今依然如故。它们与周围现代化的大厦显得不那么协调，甚至有点破旧寒酸。但它们却见证了中关村 50 多年的沧桑巨变，忠实记录了新中国 60 年科学技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